

青海湟中徐家寨画像砖墓中的佛教题材

俞 长 海

(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 青海 乐都 810701)

摘 要:青海湟中徐家寨画像砖墓中的菩萨、莲花、忍冬纹、比丘守戒施食饿鬼、空马房舍、狮兽面图案是与佛教有关的题材,为湟水流域发现较早的反映佛教信仰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徐家寨;画像砖;北魏;佛教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5)02-0132-05

一、关于佛教初传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的文献及实物资料

佛教起源于印度(天竺),佛像最早流入我国是在西汉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公元前117)。《魏书·释老志》记载:“案汉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但是史学界一般认为佛教作为宗教被有意识地引进和传播是在东汉明帝时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祭愷、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愷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魏书·释老志》)据《牟子理惑论》:“时(汉明帝)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时预修造寿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我国发现最早的佛像实物资料是重庆丰都东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砖室墓出土摇钱树佛像。^[1]关于佛教传入中国最早传播的主要路线有三种说法:西线:新疆—河西走廊—中原;南线:印度—缅甸—四川—中原;海路:江苏—河南。那么,佛教是在什么时候传入河西走廊进而影响到湟水流域的?敦煌悬泉汉简(VI91DXF13C②:30)中记载有:“少酒薄乐,弟子潭堂再拜。会月廿三日,小浮屠

里七门西入。”“浮屠里”这一地名的出现表明当时敦煌已建有佛寺或佛塔,据张德芳先生研究,将浮屠简的年代确定在公元51~108年及其前后。这是河西走廊地区最早的有关佛教传入的文献资料。^[2]但是河西地区有关早期佛教的实物资料最早出现在魏晋时期墓葬中,酒泉丁家闸5号壁画墓中出现八瓣莲花藻井,^[3]发掘报告将其年代定为后凉至北凉之间,即公元四世纪至五世纪中叶,是在公元386~441年北魏破酒泉时期。^[4]韦正先生通过与周边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陶器及壁画对比研究,认为丁家闸5号墓属于魏晋时期。^[5]

敦煌佛爷庙湾西晋早期墓M37、M39、M133覆斗形墓室顶部出现了彩绘莲花藻井,M37、M39、M133、M118墓葬照墙上出现了绘有白象的彩绘画像砖。^[6]这些佛教题材的图案渗透到了传统儒道题材中,与西王母、九尾狐、羽人、朱雀、托山力士、兽面、伯牙拂琴、受福、方相士、神马、天鹿、凤凰、麒麟、飞鱼、带翼神羊、带翼神兔以及鸡首人身、牛首人身、熊面力士、辟邪等传统儒道推崇的仙人及仙禽瑞兽等图案融为一体,佛教题材元素被作为道家思想体系中的神人或神兽或仙禽瑞兽来看待。

敦煌祁家湾北凉神玺二年(公元398年),M310中尸床上铺撒的墨书有佛教字句的陶钵片,敦煌三危山下曾有兴建三十年(343年)前凉墓出土的自称“佛女”的纪年斗瓶。^[7]

河西走廊酒泉、敦煌、武威等地发现北凉时期的石塔12座,^[8]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具东,像教弥增矣。

收稿日期:2015-01-04

作者简介:俞长海(1967-),男,汉族,青海乐都人,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史前史。

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已下者。”说明在西晋时期佛教已在河西地区广为传播,北魏时期河西地区的民众连同僧人被迁居平城地区(今山西大同市),对北魏佛教活动有直接的影响。

从前凉至北凉,河西的佛教一直得到发展,信徒众多,塔寺林立。进入北凉以后,沮渠蒙逊利用政治上的权利而崇佛,所以,北凉佛教之盛更甚于之前的诸凉政权,随着佛教影响的日益增大,信徒人数也在增加,佛教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也更加深入,佛教在河西走廊兴盛一时。据考察研究,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开凿的石窟有西千佛洞(北凉,敦煌市西南35公里处、党河北岸的崖壁上)、文殊山石窟(北凉,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镇)、千佛洞石窟(十六国晚期至北朝早期。马蹄寺东北约五公里)、上、中、下观音洞石窟(十六国晚期至北朝早期,位于马蹄寺东南约10公里的山崖上)、天梯山石窟(北凉,武威市凉州区城东南60公里祁连山麓的张义镇灯山村,石窟开凿在天梯山断崖上)、观音山石窟(大约在北凉或北魏,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城东南60公里祁连山麓的张义镇堡子街西山上)、修行洞石窟(大约在北凉或北魏,在张义镇红山沟村)、亥母洞石窟(大约在北凉或北魏,在武威市凉州区城南15公里的新华乡缠山村西的祁连山北麓)、石佛崖石窟(大约在北凉或北魏,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城西南60公里处的金山乡小口子村的南山之巅)、云庄石窟(大约在北凉或北魏,位于甘肃省永昌县东南方向的南坝乡正南约6公里的云庄山上)、灵官殿石窟(大约在北凉或北魏,在云庄石窟北约1公里处)。^[9]然而,有关早期佛教在湟水流域传播的文献及实物资料却很有限,虽有人认为西宁北山寺最早为纪念东汉邓训修建的“土楼神祠”,是佛教传入河湟地区的最早文献,但仅凭神祠二字很难推测其为道教还是佛教建筑。河湟地区关于佛教传入的最可靠的记载是在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僧人法显“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褥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10]褥檀国,指褥檀在位时的南凉国,亦以国君之名代国名。养楼山,为大通河南岸的大阪山。法显的西行路线是由长安经今兰州、西宁、大通、门源,越祁连山到张掖。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僧人昙无竭(法勇)西行求经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登葱岭,度雪山。^[11]昙无竭的行程当是从今兰州、乐都、西宁、海晏进入柴达木盆地,到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宋云与惠生“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于此……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土谷浑国……从土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12]宋云和惠生由洛阳赴西域求经的路线,就是经今乐都、西宁、湟源,越日月山,穿行柴达木盆地,到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旅程达几千里。^[13]从文献资料来看,法显途经南凉国,表明佛教已传入湟水流域,此后又有法勇、宋云及惠生等高僧途经湟水流域,但仅凭数语文献资料难以评判这些高僧对河湟地区佛教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就可以考证的实物资料来看,西宁北山寺石窟(北魏或更早)、平安县沙沟乡尕庄村东沟寺石窟(北魏或西魏)被认为是可能开凿于北魏时期的石窟,^[14]湟水流域最早的有关佛教方面的实物资料,有可能是北魏时期,但对这一观点也有不同的意见,2001年,中日丝绸之路联合考察时对西宁北山寺石窟进行了详细勘察,发现仅有三个窟内尚存佛教题材的壁画,分别是隋代、唐代一五代及宋元时期的壁画,所以河湟地区可以考证的佛教方面的地上实物资料最早似乎只能到北魏。除了上述石窟之外,还有乐都红崖寺、互助白马寺等石窟,但这些石窟中有些确知其始建年代在北朝之后,有些窟内空无一物,无法判断其始建年代。

从湟水流域已发掘的墓葬资料来看,西汉晚期至魏晋已发掘的墓葬有:湟中多巴、上孙家寨、陶家寨、南滩墓地、山陕台、彭家寨、平安北村、东村、石家营棉纺厂、古城崖、石家营、互助高寨、互助汪家庄、乐都马家台、民和胡李家、民和二中、民和川口镇、民和中川等西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墓葬400余座,均未发现与佛教有关的实物资料。目前河湟地区所能见到的最早反映佛教题材的实物资料就是平安窑房村、湟中徐家寨村发现的北魏时期的画像砖墓。

二、窑房村、徐家寨画像砖墓的概况

窑房、徐家寨画像砖墓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早期佛教传入青海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平安县窑房村清理画像砖墓两座,其中一墓虽遭破坏,但仍见134块画像砖嵌镶在墓壁上。墓葬均为单室弯庐顶砖室,画像砖图像有菩萨、供养人、甲骑、凤鸟(朱雀)、力士等五大类。^[15]2000年,湟中县徐家寨村村民在本村会龙山脚取土时挖开一画像砖墓,该墓可能早期被盗,墓顶大部分已被破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湟中县博物馆予以清理,墓葬为带有甬道的单室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墓室南北宽3.4米,东西长3.5米,画像砖题材有菩萨、比丘守戒施食饿鬼、凤鸟、力士、莲花、莲瓣、胡人牵骆驼、兽面等七大类,其中莲花纹砖是用仰莲纹和覆莲瓣纹两种不同的模具制作的。徐家寨画像砖与窑房村画像砖相比,菩萨、比丘守戒施食饿鬼、凤鸟、力士等图案基本一致。后来在湟中县博物馆根据出土时的情况复原了一面画像墓壁^[16](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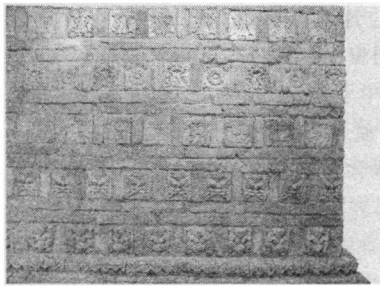


图1 徐家寨画像砖墓壁复原(摄于湟中县博物馆)

徐家寨画像砖中出现的菩萨、莲花、比丘守戒施食饿鬼、忍冬纹、狮兽面、空马等是湟水流域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反映佛教内容的图像,对于研究早期佛教在青海河湟地区的影响

与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尚对窑房、徐家寨画像砖墓的年代看法有较大的分歧,对于其年代的判定有东汉晚期至三国^[17]、汉献帝时至三国初(公元200至230年)^[18]、魏晋^[19]、十六国后半期至北朝^[20]、北朝至唐初^[21]等各种见解。笔者认为窑房、徐家寨这两处画像砖墓中出现的菩萨、仰月、莲花、莲瓣、忍冬纹、长颈壶、鸱吻庀殿、三角垂纹、垂裙皂帽、胡人牵骆驼、狮兽面、托举力士、甲骑、凤鸟衔丹等图像是北魏平城时期流行的纹样,与北魏中期的山西大同、内蒙等地墓葬、遗址及石窟中的同类图像具有较多的共同点和一致性,故将窑房村及徐家寨湟中的画像砖墓判断为北魏时期,结合河湟地区的历史沿革,可具体到北魏灭北凉并实际控制湟水流域在西宁设都善镇之后(445年),下限至535年西魏开始统治湟水流域。

三、窑房村、徐家寨画像砖墓中的佛教题材

1. 菩萨:位于墓室画像砖的最高一层,主题图像为菩萨图像。“菩萨为一头戴宝冠的立像。大耳,嘴上隐约有胡子。着汉式斜袂袈裟。脚呈八字形分开,臂部和肩披有缭绕的长飘带。右手持长颈净瓶,左手高举托着弯月。与月亮对称的另一方的上侧,为内有金乌的圆日。在湟中和平安的画像砖墓中,此种刻有托月立像的画像砖,都位于墓室四壁画像砖的最上排。而甬道两边和地面上则不铺这种托月立像画像砖,可见托月立像具有天神的崇隆地位。”^[22]菩萨面相丰满而略长,鼻梁隆起直通额际,眉长眼鼓,肩宽胸平,花瓣形宝冠、交领袈裟、帔帛搭肩穿肘外扬,帔帛下端开叉成二尖角,下身著褶裙,具有北魏中期的特征,类似的形象多见于大同云冈石窟及麦积山石窟北魏时期菩萨像。徐家寨画像砖中菩萨左手托仰月,右肩上方为内有三足乌的圆日。佛教中的仰月、或仰月冠饰代表光明与智慧,被广泛地用于佛教题材的雕刻或绘画中。克孜尔第38窟主室券顶中脊前部绘有天象图日和月。云冈第8窟窟门拱东侧摩醯首罗天正面头的三珠冠的正面装饰一仰月,这是云冈比较常见的形式。第10窟门拱上方的两身天神像虽然冠上没有装饰仰月,但各自四臂的其中两只手里,都是左手持日,右手持月。阿修罗的形象为三头六臂,其中有两臂手里分别执日、月,如庆阳北石窟寺北魏永平三年(510年)第165窟前壁门右侧的阿修罗,这种日、月都是显示光明,同样应该是受到波斯的影响,



图2 菩萨(摄于湟中县博物馆)

响,^[23]徐家寨画像砖中菩萨左手所托之月为仰月,佛教图像中的仰月最初是波斯萨珊王朝王冠上的装饰,经粟特人将其传播到云冈石窟,后又回传到敦煌石窟。^[24]徐家寨画像砖中菩萨左手所托仰月可能也是佛教回传的结果。

2. 莲花忍冬:位于徐家寨墓室从下往上数第四层。莲花作为珍草灵木,代表着佛的足迹,象征天国仙境,被广泛饰于佛座、龕桌、石窟、塔基、棺床、坐榻、庙宇、瓦当、瓶、罐、碗、钵等与佛教有关的建筑器皿上。莲是来自佛国的圣物,墓室中布置莲花意在渲染西方净土世界,表达墓主人升入天国的美好愿望。作为佛教意义的莲花最早出现在酒泉丁家闸5号壁画墓中的八瓣莲花藻井,^[25]发掘报告将其年代定为后凉至北凉之间,即公元四世纪至五世纪中叶,是在公元386—441年北魏破酒泉时期。^[26]韦正先生通过与周边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陶器及壁画对比研究,认为丁家闸5号墓属于魏晋时期。^[27]敦煌佛爷湾西晋早期墓M37、M39、M133覆斗形墓室顶部出现了彩绘莲花藻井,莲花为八瓣重层莲花,桃形花瓣。M37、M39、M133、M118墓葬照墙上出现了绘有白象的彩绘画像砖。^[28]徐家寨画像砖中的莲花为六瓣式重层双瓣莲花(花瓣中间有竖线将花瓣分成两部分),这种重层双瓣莲花纹与北魏平城遗址及内蒙古镇城遗址出土瓦当上的莲花纹较为接近。^[29]徐家寨莲花纹画像砖四角均以单朵大花忍冬纹填白,田自秉先生在《中国纹样史》中提出忍冬纹是由印度键陀罗文化吸收了古代希腊文化中的“棕叶”纹而形成的,并随佛教传入中国,^[30]忍冬纹与莲花的组合无疑表明了莲花纹砖的佛教性质。



图3 莲花忍冬(摄于湟中县博物馆)

3. 比丘守戒施食饿鬼:该画像砖布列于第三层,在鸱吻上翘的庀殿中,两个人对坐在榻上,均头戴尖顶圆帽,上身的半边袒露着,二人各伸出一臂,置于二人前的小几上。在二人中间的正上方,有插着忍冬花叶的宝瓶。榻沿有三角垂纹饰,榻前跪坐一头大身小之人,手捧耳杯,身前置长颈壶。张朋川、李汉才先生认为对坐之人为供养人,许新国先生认为对坐二人为比丘,榻前之人为饿鬼,笔者认为比丘及饿鬼见解较为合理,僧人多穿搭衣,将右臂袒露于外,这是从外表上区分守戒比丘和未守戒者的主要标志,意在表明对佛与菩萨的恭敬。《魏书·释老志》记:“诸服其道者,则剃落须发,释累辞家,结师资,遵律度,相与和居,治心修净,行乞以自给。谓

之沙门,或曰桑门,亦声相近,总谓之僧,皆胡言也。僧,译为和命众,桑门为息心,比丘为行乞。俗人之信凭道法者,男曰优婆塞,女曰优婆夷。其为沙门者,初修十诫,曰沙弥,而终于二百五十,则具足成大僧。妇人道者曰比丘尼。”比丘正上方插忍冬的宝瓶为花供养,“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之‘塔’。”比丘二人榻前的长颈壶及捧钵小人为“施食饿鬼甘露”仪式,《救拔焰口经》云:“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常以此密言及四如来名号,加持食施饿鬼,便能具足无量福德。寿命延长,增益色力,善根具足。”所以该画像砖所表现的主题是比丘守戒施食饿鬼。《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载,奉施饮食得十种功德:得命;得色;得力;得安稳无碍;得无所畏;无诸懈怠,为众敬仰;众人爱乐;具大福报;命终生天;速证涅槃。此外,以饿鬼为对象的施食仪式,称为施饿鬼、施食会。类似庑殿内夫妇并坐在榻上的图像在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墓、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31]、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 M7^[32]、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中均有发现,在鸱吻上翘的庑殿中,两个人并坐在榻上画面,旁边一般有侍者,表明庑殿并坐二人是墓主人夫妇的形象。^[33]平安窑房和湟中徐家寨墓内均有比丘守戒施食饿鬼画像砖,而且形象一致,这是画像砖模具化生产的结果,并非墓主人真实形象,意在表达墓主人生前敬佛从善的行为,以期死后灵魂得到佛的护佑和超度。



图4 比丘守戒施食饿鬼

4. 空马房舍:在东汉以来的画像砖及画像石墓中常见以马为主题的出行图,目的是表现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但画像砖中的马是既无缰绳鞍鞮,又无载物的空马,空马在佛教中象征着佛的出家,是前佛像时期流行的佛教象征图案。

东汉以来的画像砖、画像石、壁画墓形成的墓室画像三级结构中,中间一级一般是用来表现墓主人生前相关的生活图景的,如车马出行、宴饮、射猎、乐舞百戏、庖厨、耕作等,是反映墓主人生平的连环画,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徐家寨墓壁中间一级(第三层胡人牵驼、空马房舍、比丘施食饿鬼)画像砖应该是墓主人生平的写照,表明该墓主人生前与胡人和佛教关系密切,空马及比丘守戒施食饿鬼图像说明墓主人生前尊佛、敬佛甚至皈依佛门的人生

经历。



图5 空马房舍

5. 狮兽面:位于墓壁从下至上第二层。狮子是佛教中的护卫使者。据范书《西域传》,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狮子及拔符(形似麟而无角),和帝永元十三年复献狮及大鸟。佛的两大弟子中,文殊骑狮子,普贤骑象,所以狮子和大象又成为佛的象征,成为佛教中的护卫使者。敦煌佛爷庙湾 M37、M118 彩绘画像砖墓中既有狮兽面,又有白象和莲花藻井,佛爷庙湾画像砖墓中的狮兽面已经是具有佛教性质的图案了。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墓出土的透雕狮面牌饰上有佛教人物形象,^[34]湟中徐家寨狮兽面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7窟的石雕狮子^[35]、大同南郊区田村北魏墓石棺床中间的兽面形象相近,是北魏时期佛教图案。^[36]



图6 狮兽面

佛教在进入中国的初期是被当成一种方术来信奉的,因此佛陀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基本上等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神祇。佛的形象进入墓葬,在南方地区始于东汉晚期,并且一直延用至东晋时期。主要集中于两大地域,一是四川盆地,一是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和安徽地区,其它地区偶有发现,但是数量极少。^[37]在河西走廊地区魏晋时期的酒泉丁家闸壁画墓及敦煌佛爷庙湾彩绘画像砖墓中开始出现了佛教题材的莲花藻井和白象图案,这一时期,民间往往将佛教人物视为道教中的“神”来看待,认为佛界中的人物同道教中的西王母、仙人一样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能够为人间攘灾祈福,超度灵魂,死后进入天界,享受荣华生活。在十六国至北魏时期,佛教信仰逐步渗入湟水上游地区,徐家寨画像

砖中菩萨形象及菩萨左手所托仰月是北魏时期佛教由山西大同一带(北魏平城时期)向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回传的结果。民间在坚持传统神仙信仰的同时将佛教中的菩萨形象进行了改造,取代了羽人或仙人的至尊位置,反映了这一时期湟水上游地区以羽人及仙人为代表的传统道教信仰的消

退和以菩萨为尊神的佛教信仰的兴起。徐家寨画像砖墓中的菩萨、莲花、忍冬、比丘守戒施食饿鬼、空马房舍、狮兽面等图案是与佛教有关的题材,反映了北魏时期湟水流域以修行超度、转世轮回、死后进入极乐世界为最高精神追求的佛教信仰对民间的影响,是佛教传入湟水地区较早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 [1]何志国. 仙佛模式和西王母佛教图像模式说商榷——再论佛教初传[J]. 艺术考古, 2005, (4).
- [2]郝树声, 张德芳. 悬泉汉简研究[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9.
- [3][2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酒泉十六国墓壁画[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4][26]吴初骧. 酒泉十六国墓壁画[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5][27]韦正. 试谈酒泉丁家闸 5 号壁画墓的时代[J]. 文物, 2011, (4).
- [6][2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 [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 [8]孙彦. 考古所见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宗教信仰——以河西走廊为例[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08, (4).
- [9][14]杨发鹏. 两晋南北朝时期河陇佛教地理研究[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0.
- [10](日)足立喜六. 法显传考证[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 [11]释慧皎. 高僧传(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12]范祥雍. 洛阳伽蓝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13]李永翎.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在河湟地区的传播[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2, (5).
- [15][17]许新国. 青海平安县出土东汉画像砖图考[J]. 青海社会科学, 1991, (1).
- [16]张朋川, 李汉才. 湟中、平安画像砖墓内容及年代考订[J]. 丝绸之路, 2000, (24).
- [18]温玉成. “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质疑[J]. 四川文物, 2000, (2).
- [19]记者杨展望, 通讯员赵英. 湟中出土魏晋画像砖墓[N]. 青海日报, 2000—08—09 (02).
- [20]柳春诚, 江介也. 中国青海湟中画像砖墓的发现及其意义[J]. 文化史学, 2008, (64).
- [21][22]张朋川, 李汉才. 湟中、平安画像砖墓内容及年代考订[J]. 丝绸之路, 2000, (24).
- [2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物保管所编. 庆阳北石窟寺[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 [24]魏文斌. 也谈仰月、日月菩萨冠饰——以麦积山石窟为例展开[J]. 敦煌学辑刊, 2007, (4).
- [29][35]王雁卿, 高峰. 北魏平城瓦当考略[J]. 文物世界, 2003, (6).
- [30]李媛. 试论北朝莲花纹[D]. 太原: 山西大学, 2011.
- [31]王银田, 刘俊喜.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J]. 文物, 2001, (7).
- [32]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06, (10).
- [33]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1, (12).
- [34]宁夏固原博物馆. 固原北魏墓漆棺画[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 [36]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南郊区田村北魏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0, (5).
- [37]姚一斌. 六朝画像砖研究[D]. 南京: 南京艺术学院, 2004.

The Buddhist Themed Portrait of Brick Tomb in Xujiashai Huangzhong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YU Chang-hai

(Qinghai Liuwan Painted Pottery Museum, Ledu 810701, China)

Abstract: Xu JiaZhai brick tombs in Huangzhong Qinghai Province mainly include the portraits of Buddha, lotus, honeysuckle pattern, Bodhisattvan Biqiu keeps the precepts and donates food to the hungry ghosts, empty houses of horse, lions facial pattern are all related to Buddhism theme, and they are a reflection of the earlier discovery of HuangShui basin, reflecting a Buddhist faith.

Key words: Xujiashai; portrait of brick tomb;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Buddhism

(责任编辑: 李 静)